



新论

理论评论部主办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坚守魂脉和根脉的理论创新

■ 徐忠麟

理论头条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要从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两个方面，深刻把握其形成基础、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深刻揭示法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法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必然联系、法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因果联系、法在不同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中的不同功能和价值，形成了以法的物质制约性、阶级性、社会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了对法的物质制约性的认识。进入新时代，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坚持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方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了对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认识，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和根本目的。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才能更好地确保社会主义法治体现人民意志，更好地调动人民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更好地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立场贯彻于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才能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

深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法治领域的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来观察、分析、指导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这一科学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正确道路和总抓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

系，不断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工作布局；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环节；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迫切需要；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组织保障；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所在。

■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和理

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厚滋养和启迪。比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建设价值取向提供历史借鉴；“观俗立法则治”的经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历史智慧；“法与时转”“治与世宜”的社会治理观为健全和完善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理念启迪；“法立，有犯而必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的思想为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明确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提供历史依据；“得其人”“得其法”并重，“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的观点为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提供思想基础；“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的理念为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贡献治理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中的诸多思想精华，揭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底蕴、民族特色和文化血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定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重要文化支撑。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时代价值，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有益历史经验和法治智慧。

（作者系新余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

党的领导与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 陈始发 袁芳甜

思想纵横

党的历史是一部人权奋斗史，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华民族走过了百余苦难辉煌，从飘零破碎的旧社会到百业兴旺的新中国，再到欣欣向荣的新时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的人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不同于西方的人权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之所以能走出具有开创性、全面性、独特性的人权发展道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

坚持人权发展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谈人权。各国人权发展道路必须根据各自国情和本国人民愿望来决定。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借

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沿着从生存权、发展权到全面自由的发展轨道，从点、线到面的发展路径，书写了世界人权发展史上的精彩篇章，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人权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人民享有的普惠性人权。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开辟的人权道路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利益作为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开启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为中国人民各项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和不断发展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制度层面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人权事业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推进人权事

业全面发展，为中国人权事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党的领导提供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核心力量

科学探索中国人权理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权事业的领路人，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人权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学说，丰富了人类文明多样性。中国人权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经历了从一般观念、学说到规范、理论的变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中国人权理论的萌芽时期。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深入思考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了自由的来源，“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权”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1年中国发布的第一部人权白皮书指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鲜明树立起中国人权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全新的人权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人权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如“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

著的特征”“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权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人权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

有效引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实践。中国共产党是人权的最大捍卫者和促进者，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权事业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举措，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实施劳动法，到改革开放后发布人权状况白皮书、推动人权入宪，再到新时代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一直为推动人权实践而不懈努力。贫困是人权最大的阻碍。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人权保障新奇迹。

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全民族、全社会、全体中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高度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我们的体制优势，也是我们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现实需要。这一显著优势是由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

和作用决定的。一路走来，无论是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还是脱贫攻坚、抢险救灾、生态环境保护，中国共产党总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展现出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新冠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快速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为抗疫斗争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在抗疫过程中，各级党委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坚持“全国一盘棋”，形成全国上下齐动员、全体人民共奋战的生动局面。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在有效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同时，实现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综合国力稳步提升。

制定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保持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性、连续性。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锲而不舍、接续奋斗，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权事业与国家发展的总体状况基本一致，并逐步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之中。当前，我国已连续发布了十四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不仅对国家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方面的建设作出了安排，还制定了一系列推进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制度和措施。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已经发布并实施了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通过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设置各类具体指标任务，人权保障水平和人权实现程度获得了可观察、可度量、可评价的依据和标准。

（作者单位分别为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

促进红色文化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 李翔 甘根华

探索求真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积累的先进文化，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红色文化高度重视，强调要“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江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具有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在推进红色文化传播中肩负着特殊使命。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主动适应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给红色文化传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促进红色文化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集成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是增强江西红色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加强红色文化数字内容建设。数字化提升优质文化内容供给，是科技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具体要求。一要开展红色文化数据库建设。全面梳理江西红色文化的物质、制度和非物质资源，利用数字化手段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修复和再现，关联思想理论、文化旅游、新闻出版等不同领域以及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共建共享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二要丰富红色文化内容表现方式。积极利用短视频、微电影、图文H5、动漫、数字藏品、网络游戏等多种形式传播红色文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红色故事。三要打造红色文化数字

精品内容。聚力打造一批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红色题材戏剧、电视剧、电影、图书、歌曲等数字精品力作，建立优秀红色艺术作品项目库，组织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巡回展演活动，推动红色文艺精品传播与推广。

创新红色文化数字传播渠道。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有效拓展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渠道。创新运用多形态数字传播渠道，有助于构建立体化的红色文化传播格局。一要强化主流媒体数字化传播。主动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用好媒体融合过程中搭建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围绕官方网站、客户端、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入驻第三方平台的主体账号协同传播红色文化，牢牢把握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导权。二要推进新媒体传播。借助新媒体平台用户规模大、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影响范围广的独特优势，提高红色文化传播效能。三要构建跨渠道传播矩阵。加快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在平台、内容、用户、流量等资源层面的联动互动，实现红色文化跨渠道联动传播，不断提升信息覆盖面和到达率。

提升红色文化数字传播效能。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智能传播，推动信息传播不断向高效化、个性化、精准化方向转变，是提升红色文化生产和传播效能的重要途径。一要推动内容智能化创作。可以探索AIGC、大模型、元宇宙、数字人等互联网前沿技术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应用，提高内容生产与传播效率。二要开展精准传播。应用大数据和算法推荐技术对网络用户的群体特征、行为数据、内容偏好、互动评价等信息进行采集和分析，对用户进行

“精准画像”，并根据受众的需求特点，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三要培养智能传播人才。提升文化传播从业人员、网络“大V”等对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力，打造适应传播需要的人才队伍，为红色文化智能传播提供智力支撑。

搭建红色文化数字消费场景。随着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数字文化消费成为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升级的新业态。打造红色文化数字消费场景是发展数字文化消费的重要手段，不仅能反哺红色文化传播，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一要拓展红色文化消费空间。充分整合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等文化教育设施，以及社区、购物中心、城市广场、商业街区、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搭建红色文化消费新场景，满足消费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消费需求。二要创新数字红色旅游产品。大力推进红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联动发展，借助全息呈现、元宇宙、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丰富旅游景区红色文化的表现形态，优化数字化红色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智慧红色旅游新体验，增加游客的参与度、体验感和满意度。三要探索红色文化数字消费新业态。加快推动红色文化产业与直播带货、短视频推荐、社交电商等在线新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数字创意、数字艺术、数字娱乐等新型红色文化业态，推动红色文化商业模式转型升级，激活消费新动能。

（作者单位分别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哲理漫画

■ 罗琪



学习和研究好比爬梯子，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企图一脚跨上四五步，平地登天，那就必须会摔跤了。

——华罗庚